

允晨叢刊 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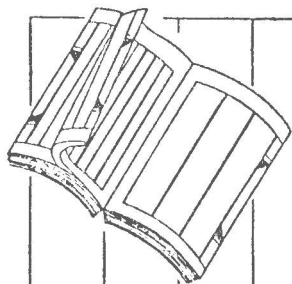
文化評論與中國情懷

余英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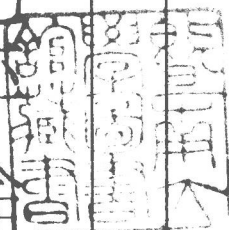


656097

G.D. 9010



文化評論與中國情懷



余英時著

允晨叢刊



90054693

允晨叢刊22

文化評論與中國情懷

作 者／余英時

發行人／林伯峰

出 版／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南京東路三段21號11樓

• 服務電話：(02) 5072606 (代表)

• F A X：886-2-5074260

• 郵政劃撥帳號：0554566-1

排 印／嘉信印刷事業有限公司

顧 問／蔡欽源、邱賢德律師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2523號

初 版／中華民國七十七年十月

定 價／180元

11F, NO. 21, NANKING E. RD., SEC. 3,
TAIPEI, TAIWAN, R.O.C.

自序

本書選收了近年來討論文化和思想問題的一部分文字。這些文字先後都曾發表在台北和香港的報刊上，特別是《中國時報》、《聯合報》、《當代》和《明報月刊》。趁這次彙集成書的機會，我對其中幾篇略作了一些增刪，但基本論旨並無改變。我很感謝各報刊的主編朋友們，如果不是他們的熱心督促，這些文字是不可能寫成的。

本書定名為《文化評論與中國情懷》；這一點也許應該略加說明。一九八五年六月董橋先生為《明報月刊》計劃了一個「中國情懷」的專頁，堅邀我參加一份，因此我便寫了那篇「常僑居是山，不忍見耳」。此文現收入本集之末，作為全書的一個附錄。但是全書

涉及「中國情懷」的僅此一篇，為什麼這四個字竟成為書名的一部分呢？這是因為本書所收的文化評論的文字都是在「中國情懷」之下寫成的我可以毫不遲疑地說，如果不是由於我的「中國情懷」在暗中作祟，這部書是不可能產生的。從前人都說，陶淵明的詩中，篇篇有酒，我這部集子中則篇篇都有「中國情懷」。

所謂「中國情懷」其實便是一種中國文化的情結。此情古人早已有之。李陵答蘇武書所謂「遠託異國，昔人所悲；望風懷想，能不依依。」便已道出此中癡結。李書雖偽，其情則絕不能偽。像我這樣早年受中國文化陶冶的人，是不可能完全忘情於中國的。但是這祇是文化上不能忘情，卻與現實政治之間並無必然的關係。本書所收文字中雖間有關涉政治的部分，然而其基本立場仍是文化的。文化包涵了政治，同時也超越現實政治，這是本書的一個中心論點。

我是在一九五〇年離開中國大陸來到香港的，然後再移居到美國，以現實生活而言，我不但早已與大陸脫了節，而且和臺灣更是向無淵源。七十年代以後，我在學術思想上開始和臺灣發生了較為密切

的聯繫，但是我在臺灣的訪問從來沒有超過兩個月以上。從文化觀點說，大陸、臺灣、和香港在我心中都是中國的一部分。如果說，我的學術工作和臺灣、香港關係較深，而和中國大陸的距離較遠，那完全是由於政治現實造成的，在過去三、四十年間，我的「中國情懷」祇有去臺灣和香港兩地才有自由表達的機會。今天的情況已大有不同，「遠托異國」的人也可以和大陸的學術文化界發生有實質意義的交流。這當然更增強了我們關於文化可以超越政治的信念。但是最後我願意強調一點：本書各篇文字都是以整個文化中國為對象；而我個人所關懷的也從來便是整體中國文化的前景。因政治現實而產生的地域界線在本書中是不存在的。

余英時

一九八八年十月十日於普林斯頓

【文化評論與中國情懷】

目 錄

序.....	一
文化危機與趣味取向.....	三
國家觀念與民族意識.....	一七
科技文化與大眾文化.....	三三
文化建設私議.....	四九
『五四』——一個未完成的文化運動.....	六五
人文與自然科學應如何均衡發展——與吳大猷先生對談.....	七三
中國知識分子的創世紀.....	八九
略說中西知識分子的源流與異同.....	一一一
「對塔說相輪」.....	一二五

「對塔說相輪」補篇	一四一
關於韋伯、馬克思、與中國史研究的幾點反省	一六三
翻譯與外來觀念	一八九
中國國民黨與思想現代化	二〇三
廣乖離論	二一七
傳統文化與現實政治	二三五
一葉知秋——中共批判馬克思主義的始點	二五九
衝決極權羅網的「反思」	二六九
虎年說「風」	二七七
陳寅恪的「欠斫頭」詩文發微	二九一
文史互證・顯隱交融	三一七
跋新發現的陳寅恪晚年的兩封信	三四一
「用志不分，乃凝於神」	三六一
欲超勝負入中年	三六九
「常僑居是山，不忍見耳！」	三七五

文化危機與趣味取向

「文化危機」是現代的一種普遍現象，從西方到東方都可以看到。一般研究文化現象的學者都一致認為這是現代化的必然後果。在現代化的過程中，傳統的古典文化和價值系統經不起現代力量的推排、侵蝕，逐漸地解體了。而另一方面，一個可以代替古典傳統的新文化卻並沒有出現，至少我們一般所說的現代新文化並未能取得和古典文化並駕齊驅的地位。無論是文學、藝術、思想、戲劇、音樂、或建築，現代的表現似乎都缺乏持久性，往往像一陣狂風驟雨，其興也暴，其去也疾，很少能達到「經典」的地位。也許這正是現代新文化的特色，反映了工商業社會的性格。

但問題尚不止此，更嚴重的是嚴肅的文化工作者，包括文學家、藝術家、思想家、音樂家、戲劇家、建築家等，在現代社會中普遍地不受尊重，甚至還受到摧殘。以當前的世界來

說，在極權統治下的社會中，文化工作者沒有創作和表現的自由自不必說，即使在所謂「自由」的社會中，他們不但在物質生活上沒有基本的保障，在精神上也得不到應有的尊崇。以傳統古典社會與現代社會相比照，文化工作者顯然已從中心退居邊緣的地位了。這當然是就文化工作者的一般情況來說的，至於少數成爲「文化明星」的時代寵兒，當然不能包括在內。但少數的例外不足以否定上面所描寫的一般現象。

造成「文化危機」的所謂「現代化的力量」，事實上便是工商業社會的興起，特別是商業化的趨向。西方古典文化的遭受摧殘，依照雅倫德女士 (Hannah Arendt) 的分析，可分成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十八、十九世紀的庸俗商業社會把一切文化成品貶化成「交換價值」；第二個階段是廿世紀消費大眾社會的出現。文化危機在這一階段才發展到最高峯。一切文化成品現在都變成了消費物品。

文化成品之所以淪落爲消費物品是因爲它具有一種消費功能——娛樂。消費大眾社會的「文化取向」正是以娛樂爲主。如果只是把古代經典作品、繪畫之類以廉價方式加以複製，使消費大眾人人都可以有機會接觸到古典文化，這當然是好事。但是如果把莎士比亞的劇本改編爲娛樂的對象，搬上銀幕，以迎合消費大眾的低級趣味，那便是摧殘文化而不是文化普及了。但是現代文化的危機則正潛伏在這裏。文化成品的特徵即在其具有持久性，而消費物

品的特性則恰恰相反，即一面製造，一面消費，是永遠保存不了的。

上面所說是現代社會的一般情況，主要以西方的文化危機為主。中國的文化危機則遠比西方為嚴重。我們的文化遺產在現代反傳統和慕西化的雙重打擊之下，已沒有多少剩下來了。禮樂教化早已為現代中國知識分子所齒冷不必去說，即使琴、棋、書、畫這一類藝術修養也被看作「舊式士大夫」的清閒活動而嗤之以鼻。以戲劇而言，不但典雅的崑曲早已沒落到難以挽救的地步，即使流行了一兩百年，而且是「雅俗共賞」的京劇，現在也已少有問津者了。

我對於臺灣的文化狀況瞭解得有限，不敢亂說，但以我浮光掠影的印象，覺得臺灣社會基本上也走上了以娛樂為主要文化取向的道路。各大報刊為了爭取銷路，往往特別重視「娛樂版」。影星、歌星所受到的重視遠在文學、藝術工作者之上。我決無輕視影星、歌星的傳統偏見。嚴肅的電影工作者、歌唱家、舞蹈家同樣是藝術工作者，他們的社會地位和政治家、工業家、學者、詩人等毫無二致。但熟悉臺灣報刊「娛樂版」的人應該比我更清楚：這些關於影星、歌星的報導，究竟有多少是和「藝術」有關的呢？

我曾一再說過，文化發展是全社會的事，決不能由政府單獨負責。只有極權國家的文化

才是完全在政治的操縱之下。所以政府、工商界、影劇界、出版界、新聞界、文學界、藝術界……都應該好好反省一下，我們是不是必須以消費功能來看待文化呢？是不是除了娛樂之外便不需要別的精神生活呢？即使我們必須重視娛樂，是不是娛樂的境界也可以提昇到聲色犬馬、大吃大喝以上呢？

日本也已走上了消費大眾社會之路，但是，傳統的藝術修養還多少保留了一些。禪道、書道、茶道、棋道、花道……等依然存在，也依然受到一定的重視，這些「道」其實都是唐宋以來，從中國傳過去的，現在臺灣也有這些文化活動嗎？至少從大眾傳播上，我不大看到這些活動。以我比較熟悉的「棋道」而言，除了林海峯「爲國爭光」時看得到一些轟轟烈烈的報導外，圍棋的動向報章上是不大刊登的。報導林海峯的成就也依然是從「功能」的觀點出發，他爲中國人揚眉吐氣，爲國家爭取了榮譽。這仍然不表示對「棋道」本身有任何尊重的意味。以我所知，臺灣的「棋道」不但比不上日本和韓國，也遠遠落在中國大陸之後。臺灣唯一的「圍棋」刊物從來不敢刊登一篇大陸棋手的棋譜，臺灣的棋士怎麼會進步呢？將來有一天參加國際棋賽時，遇到大陸棋手怎麼會贏呢？（按：這篇文章是一九八五年四月寫的，一九八七年，大陸棋譜已出現在臺灣《圍棋》上了。）「棋道」和一切文化活動一樣，是超越國界和政治的，完全從實際功能的觀點出發，決無「道」之可言。

以經濟體系言，香港和臺灣同屬於自由競爭的（或「資本主義」的）型態，只有程度上的不同。但以文化面貌言，則二者相去遠甚。由於一百多年來，英國人一直刻意地把香港變成一個典型的殖民社會，無論是高級文化或民間文化都得不到正常的發展。英國本土是歐洲文化最深厚的中心之一，但是英國人卻最怕殖民地的土著有獨立的、批判的思想能力。所以在高級文化領域內，香港政府在第二次大戰以前一向只提倡「國粹」。魯迅在一九二七年所寫〈略談香港〉一文（見《而已集》）的確抓住了香港「文化政策」（如果真有這樣一個東西的話）的精神。魯迅所記當時港督金文泰關於在港大設「華文系」的演詞（即所謂「金制軍演說詞」）尤其是研究香港「文化史」的一篇重要文獻。那時的香港政府只希望用「國粹」來攏絡一些上層「太史」、「爵紳」，以收殖民統治之效。這種「政策」事實上一直延續到五十以至六十年代。香港學術文化界開始活躍，一般大學生、中學生對於文化、思想漸漸發生興趣，是最近二十年的事情。七十年代初期唐君毅先生說過，他以前雖住在香港，但和香港社會卻是「互不存在」。這句話當時曾受到左派青年的激烈批判，但事實確是如此。即使在今天，對文化、思想、學術、藝術等有真正興趣的人仍然是和香港社會脫節的，可以說是「孤島上的孤島」。臺北的學術文化講演，動輒可以吸引兩三千聽眾，這在香港是不可想像的。我從前在新亞書院時，每次請外來學者講演（包括大名鼎鼎的李約瑟在內），總要

就心有沒有人來聽。一九七三年秋天，美國著名的社會學家柏森思（Talcott Parsons）路過香港。他告訴我，他連絡不到任何同行，因此在飛機場上只有裁縫代表來歡迎他，要他訂製幾套西服。這種小故事十足地說明了香港社會和上層文化的關係。如果柏森思去臺北，那是一定會轟動整個學術文化界的。最近十年來香港在這一方面有沒有改進，我不太清楚。但縱有進步，我想也有限得很。

香港也談不上有真正的民間文化。整個地看，大約「聲色犬馬」四字足以盡其「文化」的特色。「上層」人士最欣賞的大概是「跑馬文化」，所以沙田新建的跑馬場具有象徵意義。跑馬文化當然也可以「雅俗共賞」，不過上層人士似乎對此更有偏愛。至於一般社會大眾則流轉在黃色的潮流之中，身不由己。據我最近所看到的一篇報導，一九八四年香港的各類刊物的銷數普遍下降，獨有所謂「馬經」和「三字經」者雙峯並峙、二水分流。這種情形已經用不上「文化危機」這個名詞了。根本沒有「文化」，尙何「危機」之可言？這是世界末日即將到來之前的麻醉而已。西方社會當然也有黃色泛濫的情況，但那只限於少數心理變態的人的精神寄托之地，西方文化的主流（包括上層文化和民間文化）仍然屹立未倒。

香港大多數的中國人都勤奮上進，在經濟發展上創造了奇蹟，這已是不容否認的事實。但他們何以眼看著這個社會在精神上如此墮落而竟無動於衷？這實在是一個頗難索解的現

象。我已說過，這種畸形的文化狀態，其最初的根源乃在英國人的殖民政策。但是今天的香港已是一個以中國人為主體的經濟社會體制了。如果沉默的大多數有文化的自覺，他們是有能力扭轉局面，創造一個融合中西之長的新文化的。到今天為止，香港所享有的「自由」是任何其他地區的中國人社會所望塵莫及的。但是在文化的層次上，這種自由似乎負面的意義遠大於正面的意義。

十二年以後，香港即將面臨一個歷史性的巨變。如果香港人珍惜自己目前所享有的自由生活方式，他們必須在文化創造上表現自由的潛力。難道香港人真相信可以恃「馬經」和「三字經」為「文化長城」以與「馬列經」相抗衡嗎？難道僅憑「在商言商」這種近視的功利觀念便能保證一九九七以後的「五十年不變」嗎？「馬經文化」和「三字經文化」將來不但不能不變，而且也不應該不變。所以如何提昇精神生活的「品味」或「趣味」，展開一個自發而普遍的文化清整 (purification) 運動是當前香港最急迫的一項任務。在我看來，這是比政體如何改組、經濟社會體制如何維持等技術工作遠為重要、也遠為基本的最大問題。在未來十年中，香港是有客觀條件和精神資源來發動並完成這一文化運動的。但沉默多數的文化自覺無疑是運動的起點。時間不多了，我希望香港社會可以運用一切大眾傳播工具來進行這一運動。

中國大陸的文化問題和臺灣、香港完全不同。大陸上以前並沒有因商業化而來的「低級趣味」的問題。（按：近兩三年來大陸不幸也已出現了「低級趣味」一九八八年八月補註。）但是三十多年來由於政治污染泛濫成災，中國人的文化意識一直是受著嚴重的壓制的。更由於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下，文化被看成社會經濟型態的附生現象（epiphenomenon），它本身並沒有獨立的實質，只剩下一點「形式的」意義而已（即所謂「民族形式」）。所以，從「趣味」（taste）的角度觀察，大陸在過去三十年間根本不發生文化趣味是「高級」或「低級」的問題，而是「味在酸鹹之外」，即只有「政治趣味」，而整個地沒有「文化趣味」。

但是這種情況最近幾年來似乎已有所改變。我最近收到大陸學者寄來一本《中國文化研究集刊》第一期，是復旦大學出版的（一九八四年三月）。這是大陸三十多年來第一次對「文化」和「文化史」的相對獨立意義予以公開的肯定。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可喜的新發展。儘管其中有些作者仍不脫馬列主義的八股（這一點自不能深責），但也有幾篇很有獨立見解的文字，如張岱年先生的〈論中國文化的基本精神〉即是一例。張先生從①剛健有爲，②和與中，③崇德利用，和④天人協調四個大範疇來討論中國文化。他有不少看法和我的《從價值系統看中國文化的現代意義》是不謀而合、或至少可以互相溝通的。從這本《集刊》中，我們知道大陸的史學家正在計劃編寫一部大規模的中國文化史。這更表示對中國文化的進一步

的肯定。

但是大陸的學術界畢竟和「文化」、「文化史」這個學術領域隔絕得太久了。《集刊》作者所理解和徵引的關於「文化」的種種概念在西方早已過時了。其中最新的是一篇評論斯諾（C. P. Snow）關於兩個文化的爭論，但作者對於這一爭論在西方文化中的源流似不甚了了〔例如這一爭論早在二八二二年便在安諾德（Matthew Arnold）與赫胥黎（T. H. Huxley）之間展開〕。討論人文學與自然科學的異同而不上溯至維柯（G. Vico）與狄爾泰（W. Dilthey），尤其無從澄清問題的關鍵所在。至於最近二三十年來人類學、社會學和史學界關於「文化」問題的無數新研究，大陸學術界一時自然還不能廣泛地接觸到。但這足認真研究文化和文化史的人所必須補上的一課。

以最近西方的史學趨向來說，斯諾的「兩個文化」並不是研究的重點所在。英、法、美三國的史學家現在最注重的「兩個文化」乃是上層文化（elite culture，中國的「士大夫文化」近之）和民間文化（popular culture）。他們大體上以十八世紀赫德（Herder）的觀念為出發點，即認為一切創造性的文化都起源於下層人民。但所謂「民間文化」卻又不完全屬於下層人民。而上層文化與民間文化之間則又存在著各種錯綜複雜的關係，並且經過各種不同的歷史發展的階段。布克（Peter Burke）一九七八年的《近代早期歐洲的民間文